

从东方学到区域研究

——德国区域研究的历史沿革及启示

邓白桦

摘 要：本文对德国区域研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回顾了其自古典东方学到现代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提出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可以从组织架构、机构设置、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共建等方面借鉴德国区域研究的经验。在组织架构上，我国可以建立顶层机制进行统筹规划，就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进行研究和理论创造。在机构设置上，我国可以根据各高校的办学特点，以特定区域为单位建立研究中心，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跨区域研究联盟。在学科队伍上，各高校可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建立多学科、跨学科的人才队伍。在人才培养上，各高校可以以外语知识和技能学习为基础，以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和理论方法学习为主导，为本硕博各阶段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规划性和连贯性。在学科共建上，各高校可以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向科研机构 and 科研人员提供项目资助。

关键词：德国； 区域研究； 区域国别学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副教授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50； 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3)06 - 0004 - 26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学科创建时期，对国外区域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从而分析其对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借鉴和启示，无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却很少涉及其他国家区域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本文旨在研究作为欧洲重要成员国德国的区域研究发展历史及现状,以期为我国当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些许启示和借鉴。

一、德国区域研究的前身

德国的区域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以及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学术范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而若对德国区域研究进行学术溯源,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东方学。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东方学是区域研究的学术源头,而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者”^①,德国的区域研究亦是如此。

(一) 萌芽——摆脱神学桎梏的东方学

早在14世纪初,为了借助希伯来语等东方语言来解读《圣经》,欧洲大学的神学系就已经出现东方学的雏形。1312年,维也纳教会理事会决定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阿维尼翁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等一系列教席。^②那时候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基本上是指近东或北非地区,东方语言也主要是指这个地区的语言。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东方学的首要目的是为神学服务,因此东方学家大多是神学家,教学素材均来自《圣经》《古兰经》等神学文本,所采用的方法是语言训诂学的方法。^③这一传统也影响着德国早期的东方学,18世纪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等高校的东方学都遵循着神学传统,东方学的教席都隶属于神学系。

打破欧洲东方学神学传统的是1795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东方语言专门学校(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这所成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学校为了彰显其与传统大学的不同,彻底抛弃了东方学的神学色彩,其使命是教授活生生的东方语言,并且要对国家的政治和商业产生实用价值,如培养外交口译人才。该学校最先开设的语言课程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和马来语,^④教学方法包含语文学方法、历史批评和语法分析等。^⑤巴黎东方语言专门学

^① 李晔梦:《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趋势》,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第127-136页,这里第127页。

^② 参见王启龙:《区域国别学十问》,载《外语教学》,2023年第2期,第10-17页,这里第11页;刘超:《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脉络》,载《学海》,2022年第2期,第56-61页,这里第57页。

^③ Vgl. Sabine Mangold, *Eine „weltbürgerliche Wissenschaft“ — Die deutsche Orientalistik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4, S. 30.

^④ „Une histoire riche“, <http://www.inalco.fr/institut/presentation/histoire>, 访问日期:2023-11-05。

^⑤ 同注^③, S. 41。

校的成立,标志着法国东方学从服务于神学的古典东方学向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实际需求的现代东方学的转变。

法国的东方学转型影响了19世纪初期德意志地区东方学的发展,此时的巴黎已经成为全欧洲年轻东方学者的朝圣地。作为法国近邻的德意志诸邦派遣了20多位学子进入东方语言专门学校求学,其中多位成长为德意志闻名遐迩的东方学教授,如后来执教于莱比锡大学的海因里希·雷贝莱希特·弗莱舍尔(Heinrich Leberecht Fleischer)教授。^①随着英国亚洲学会发行的研究期刊《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的传入,德意志地区也出版发行了类似的非神学主题的东方学期刊,如后来提出汉藏语同源的著名东方学家柯恒儒(Julius Heinrich Klaproth)就曾于1802年创办了《亚洲杂志》(*Asiatisches Magazin*)。^②

德意志的东方学在19世纪获得快速发展,但与英国和法国不同的是,处于邦国林立之时的德意志在海外并没有殖民地,甚至直到19世纪中期,大多数德意志邦国与东方国家之间鲜有政治和经济往来。因此这一时期德意志地区东方学迅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并不是来自殖民主义的需要,而是来自世俗社会,如人文主义者对东方国家的语言、文学、历史和科学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浪漫派对东方的无限向往。德意志浪漫派出于对纯理性主义的反叛,将东方当作古希腊古罗马的替代和补充,塑造出一个原始的、前工业化的、宗教的和异国情调的东方形象。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1808年出版的《关于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中就提出,东方的语言、哲学和古代历史都是值得学习的,他认为东方的语言和文学在诗意的美感和哲学的深刻性方面并不亚于古希腊古罗马。^③德国有两位著名的浪漫派诗人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东方学教授,一位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另一位是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④德意志学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促进了东方学的快速发展,在弗莱舍尔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德意志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于1845年10月成立,并于两年后创办《德意志东方学会会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该组织随即成为德语区最有影响力的东方学学术协会,会员人数在次年就超过两百人,1860年更是高达566人,其中有不少是中学老师、神学家和宗教学者,可见其社会影响

^① Vgl. Sabine Mangold, *Eine „weltbürgerliche Wissenschaft“ — Die deutsche Orientalistik im 19. Jahrhundert*, S. 41.

^② 同上, S. 44。

^③ 同上, S. 45 - 46。

^④ 同上。

面之广。^①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后期,受英国和法国东方学转型的影响,德意志东方学也逐渐脱离神学窠臼。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一些知名学府如耶拿大学、波恩大学等纷纷将东方学教席从神学系移至哲学系,并由在巴黎接受过现代东方学培训的东方学家担任授课教师。^②19世纪中期以来,德意志的东方学在欧洲处于领先水平,诞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东方学家。^③东方学涵盖的语种范围得到扩大,研究和教学也不再只为解读《圣经》服务,而是为了解东方国家各方面的知识,研究重点以语言、文学、宗教和文化为主,其中德意志浪漫派对于东方学世俗化的推进功不可没。1834年,德语中已经出现“东方研究”(Orientalische Studien)这一概念,并在1889年首次使用更具学科性的词语“东方学”(Orientalistik),可见东方学已经逐渐获得学科认可。^④

(二)制度化建设的开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东方学

1871年,德意志民族终于迎来了国家的统一。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相信,对于德国人而言,首要任务是保卫和平,巩固来之不易的德意志统一,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随着1882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政治斗争的需要,^⑤俾斯麦逐渐放弃克制的殖民政策,德意志帝国于是加入英、美、俄、法等世界强国队伍,在非洲、拉美、东亚等地争夺海外殖民地。1884年11月,俾斯麦邀请英、法、俄、荷等15个欧洲国家在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举行会议,商定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与发展贸易事宜。柏林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欧洲列强正式瓜分非洲,也标志着德国殖民主义时代的正式开启。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帝国的世界霸权计划,为帝国的外交政策、殖民行动提供特定的殖民地语言和专业服务,在俾斯麦的倡议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和普鲁士

^① Vgl. Holger Preissler,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145, Heft 1, Hubert, Göttingen, 1995, S. 241 – 327, hier S. 289, 298 – 299.

^② Sabine Mangold-Will, „Die ‚Orientalistik‘ an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https://www.rheinische-geschichte.lvr.de/Epochen-und-Themen/Themen/die-orientalistik-an-der-rheinischen-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et-bonn/DE-2086/lido/62d572ef58e115.48112481>, 访问日期:2023-11-05。

^③ 其中关于德国汉学在19世纪的发展,参见李雪涛:《德国汉学的滥觞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载《国际汉学》,2007年第1期,第168-185页。

^④ Vgl. Sabine Mangold, *Eine „weltbürgerliche Wissenschaft“ — Die deutsche Orientalistik im 19. Jahrhundert*, S. 12.

^⑤ 陈晓春:《俾斯麦和德国的早期殖民地扩张》,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第91-97页,这里第93页。

教育部决定出资^①,效仿法国和奥地利建立东方语言学院,培养口译等外交实用人才。1887年10月27日,柏林大学成立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这在后来被认为是德国区域研究制度化的开端(Beginn d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Regionalstudien)。^②东方语言学院的成立,开创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实用为目的的域外研究。最初,除了汉语、日语、印度斯坦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言以及非洲语言斯瓦西里语,东方语言学院还教授相关地区的宗教、习俗、法律、经济、地理和历史等实用知识。随着德意志帝国对外扩张势力的加强,1890年之后,除了斯瓦西里语,其他非洲常用语言如豪萨语、埃维语和赫雷罗语也被纳入东方语言学院的教学计划,实用知识的教学内容也扩展到热带卫生、热带作物和制图等。^③前来就读的学生包括想进入外交部门工作的年轻人以及来自外交、军事、商业和行政部门的德意志帝国外交人员。

在德国海外殖民扩张的浪潮中,继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学院之后,德国其他地区也涌现出服务于帝国海外殖民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如在负责教育的汉堡参议员维尔纳·冯·梅勒(Werner von Melle)的大力推动下,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 Kolonialinstitut)于1908年成立,重点关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与德国海外势力相关的问题。次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了德国第一个非洲研究教授席位,东亚、日本及印度的语言和历史教席随后也相继设立。自此,汉堡成为继柏林之后德国非洲研究的另一重镇。帝国殖民办公室每学期都会派大约20名殖民官员到汉堡接受培训。^④与此同时,莱比锡大学也逐渐开展服务于德国海外殖民的研究,领域涉及非洲语言学、殖民地理学和民俗学。^⑤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以及一批研究期刊和书籍也应运而生,如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在1910年已经拥有31000册图书,^⑥1886年《非洲语言杂志》(*Zeitschrift für Afrikanische Sprachen*)创刊,1897年《东方语言学院通讯》(*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①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Asien* 137, Oktober 2015, S. 141 – 155, hier S. 143.

② Vgl.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2006, S. 10, <https://www.wissenschaftsrat.de/download/archiv/7381-06.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③ Vgl. Astrid Brochlos, „Das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und die Japanbezogene Lehre“, in Gerhard Krebs (Hrsg.), *Japan und Preußen*,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2002, S. 145 – 162, hier S. 147, 154.

④ Hendrik Tieke, „Universitätswerdung in vier Akten“, <https://www.uni-hamburg.de/newsroom/19neunzehn/2020/0415-universitaetswerdung-teil-4.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⑤ 袁明清、刘中民:《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载《德国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8页,这里第9页。

⑥ 同注③, S. 148。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以年刊的形式开始出版发行,1910年汉堡殖民学院出版丛书第一卷《东非手工业和工业》(*Handwerk und Industrie in Ostafrika*)。^①

殖民主义时期,德意志帝国在政府主导下开始了域外研究的制度化建设,其目的主要是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服务,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反映了帝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利益,对于这些区域的语言文化等研究也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和种族歧视色彩,如将非洲语言分为含米特语、班图语和苏丹语,含米特语因为和欧洲语言相似而被视为最先进的语言,班图语次之,而苏丹语则被视为非洲最原始的语言。这种将原本边界模糊且不可分的人类活动进行分类,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人为地加剧非洲的族群分裂。^②

(三) 范式转变——内涵更丰富、更系统化的外国研究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殖民大国的梦想破灭,德国失去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帝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魏玛共和国。共和国宽松自由的教育理念、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给旧帝国时期为殖民扩张服务的域外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早在1912年,德国社会就有人提出把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扩建成“外国(研究)大学”(Auslandshochschule),对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系统性研究。由于德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东方语言学院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101人增加到1909—1910年的298人,教职人员也从11人增加到46人,^③东方语言学院的规模似乎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因此,1913年,公众开始讨论将东方语言学院转变为外国研究大学,要求将“对外国人民的研究”纳入一般科学。^④

设立外国研究大学的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在魏玛共和国新的条件下,从事外国研究的机构在德国逐步建立起来。1919年5月,汉堡建立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脱胎于汉堡殖民学院的汉堡大学,不仅保留了原来殖民研究所的各个专业,而且将外国研究视为汉堡大学有别于其他高校的独特之处。1921年,汉堡市出台《高校法》(*Hochschulgesetz*),将“促进外国学和殖民学”(Förderung der Auslands- und Kolonialkunde)作为汉堡大学的一项特殊任务。^⑤秉承这一办学特色,汉堡大学开展了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研究,并对世界经济、海外贸易、热带医

^① Franz Stuhlmann, *Handwerk und Industrie in Ostafrika*, <https://archive.org/details/handwerkundindus00stuhuoft/page/n7/mode/2up>, 访问日期:2023-10-25。

^② 参见袁明清、刘中民:《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第10页。

^③ Astrid Brochlos, „Das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und die Japanbezogene Lehre“, S. 155。

^④ Vgl.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5。

^⑤ „Hochschulgesetz“, <https://www.digi-hub.de/viewer/fulltext/BV041067391/2/>, 访问日期:2023-11-05。

学进行研究,还设立了德国第一个国际私法和外国法(Auslandsrecht)教授席位,担任该教席的阿尔布雷希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也是1923年汉堡大学成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Institu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主任,该研究所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之一。^①当时的汉堡大学可谓德国第一个外国研究(Auslandswissenschaften)中心。^②

除此之外,各高校已有的东方学研究开始细化。除了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汉堡大学,海德堡大学(1919年)、哥廷根大学(1925年)和波恩大学(1926—1927年)也分别建立了汉学系,而法兰克福大学于1925年成立了中国研究所(China-Institut)。对中国的研究在德国大学哲学系^③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渐获得认可。这种东方学内部的细化也体现在专业期刊的增加上。1920年,犹太裔汉学家布鲁诺·申德勒(Bruno Schindler)在莱比锡创办期刊《亚洲专刊》(Asia Major),该杂志侧重文化研究,刊载德文、法文和英文文章,很快就成为德国东亚研究有影响力的平台,吸引了德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投稿。^④1925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创建了同样偏向于文化学的杂志《中国学》(Sinica)。该杂志由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出版,是德国第一本刊登中国作者文章的杂志。^⑤

同时,德国也开始在高校外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所。1925年5月,在德国前驻日大使威廉·索夫(Wilhelm Solf)的建议和犹太裔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支持下,日本研究所在柏林成立。该研究所全称为“促进德国和日本知识界和公共机构相互了解研究所”(Institut zur Förderung der wechselseitigen Kenntnis des geistigen Lebens und der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in Deutschland und Japan),这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独立的日本研究所,致力于研究日本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⑥1930年1月,为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特点和“消除误解”,

^① „Zur Geschichte d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https://www.uni-hamburg.de/einrichtungen/zentrale-einrichtungen/arbeitsstelle-fuer-universitaetsgeschichte/geschichte.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② Rainer Nicolaysen, „Wandlungsprozesse d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im 20. Jahrhundert“, <https://www.uni-hamburg.de/newsroom/19neunzehn/2020/0415-universitaetswertung-teil-4.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③ 当时的德国大学基本上分为四个系(Fakultäten),即哲学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20世纪初一些新成立的德国大学如汉堡大学不再开设神学系,而是增设了数学-自然科学系。

^④ 该杂志曾几度中断办刊,1995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支持下,该杂志社迁往台湾继续出版,参见“Asia Major”, <https://www1.ihp.sinica.edu.tw/en/Publications/AsiaMajor4>, 访问日期:2023-11-05。

^⑤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6。

^⑥ Eberhard Friese, „Gründung und Ambiente der Deutsch-Japanischen Kulturinstitute in Berlin (1926) und Tokyo (1927)“, Japanisch-Deutsches Zentrum, *Festschrift zur Einweihung des Gebäudes der ehemaligen japanischen Botschaft in Berlin-Tiergarten*, Japanisch-Deutsches Zentrum Berlin, 1987, S. 28-44。

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Ibero-Amerikanisches Institut)在柏林成立,由原普鲁士文化部部长奥托·博利茨(Otto Boelitz)担任所长。^①

然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时期的政治高压严重摧残了德国的教育和文化,也给德国的外国研究蒙上了历史的阴影。不少学者追随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公共场合举办演讲和讲座,为纳粹党摇旗呐喊,甚至成为纳粹党成员。例如,德国第一位非洲研究教授、汉堡大学非洲语系主任卡尔·曼霍夫(Carl Meinhof)在1933年5月加入了纳粹党。^②他所在的汉堡大学也有许多教授在同年11月的《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积极拥护纳粹党的学者很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如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的汉学家颜复礼(Fritz Jäger),不仅在两年后获得汉堡大学汉学教授席位,还于1938—1941年担任汉堡大学哲学系系主任。^③

与此同时,随着纳粹上台后的“一体化”政策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政治上倾向于社民党和共产党或有犹太血统的学者陆续被各高校、研究机构开除。据统计,遭受纳粹迫害的中国研究学者目前能确认身份就多达50位,绝大多数被迫流亡。^④其中申德勒由于其犹太人身份被迫于1933年流亡英国,《亚洲专刊》也因此停刊,1949年该期刊得以在英国复刊出版。^⑤柏林东方语言学院院长、德国现代伊斯兰教研究的奠基人欧根·米特沃赫(Eugen Mittwoch)由于其犹太血统于1933年被解职并于1939年移居英国,协助英国信息部^⑥处理阿拉伯和波斯问题。^⑦汉堡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巴托尔迪也因其犹太血统于1934年被迫辞职并移民英国。^⑧

外国研究的学术机构或被纳粹政府直接接管,或被置于纳粹党官员直接

^① „Geschichte des IAI“, <https://www.iai.spk-berlin.de/das-iai/geschichte-des-iai.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② Hilke Meyer-Bahlburg/Ekkehard Wolff, *Afrikanische Sprache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75 Jahre Afrikanistik in Hamburg (1909—1984)*, Berlin/Hamburg: Reimer Verlag, 1986, S. 60.

^③ Ernst Klee, *Das Personenlexikon zum Dritten Reich. Wer war was vor und nach 1945*,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Verlag, 2003, S. 280.

^④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7.

^⑤ “Asia Major”.

^⑥ 英国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简称Mo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成立,负责对内对外宣传并审查被认为具有军事价值的信息。详见“A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39—1946”, <https://moidigital.ac.uk/>, 访问日期:2023-11-05。

^⑦ „Eugen Mittwoch“,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ittwoch-eugen>, 访问日期:2023-11-05。

^⑧ Rainer Nicolaysen, „Wandlungsprozesse d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im 20. Jahrhundert“, <https://www.uni-hamburg.de/einrichtungen/zentrale-einrichtungen/arbeitsstelle-fuer-universitaetsgeschichte/geschichte.html>, 访问日期:2023-11-05。

控制之下,成为纳粹当局进行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场所。1934年,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由德国退役少将、纳粹党追随者威廉·法佩尔(Wilhelm Faupel)接管,并向德国各部委和国外直接提供宣传性出版物。^①1937年,汉堡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被迁至柏林,并入德国外交政策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Außenpolitische Forschung)。而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则经历了多次机构调整,1938年短暂更名为“外国(研究)大学”(Auslandshochschule),1940年与私立的德国政治大学(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合并为柏林大学外国研究学院(Ausland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德国外国学研究所(Deutsches Auslands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由党卫队司令部指挥官兼国家安全部世界观研究部门官员弗朗茨·斯克斯(Franz Six)直接领导。^②域外研究受到纳粹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或许跟纳粹党描绘的战争获胜之后的宏伟蓝图有关,如1941年5月的《汉堡新闻报》报道,“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再次拥有殖民地”,“我们的大学首先要培养我们在未来的殖民地所需要的专家”^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域外研究先后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兴盛和纳粹时期的至暗时刻。魏玛时期相对多元化的社会、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文化政策、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推进、科学界与企业界的密切联系等,推动了域外研究的快速发展。德国建立了一批高校内和高校外的域外研究新机构,创建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域外研究学术期刊。可惜好景不长,纳粹上台后,一批知名学者或因种族原因或因政治原因被迫流亡,成为英美等国家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离去给德国学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且影响深远,相关研究机构也沦为纳粹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场所。不容忽视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域外研究出现了范式转变,即从帝国时期殖民学背景下专注于语言及专门知识的东方学转向内涵更丰富、更系统化的外国研究。^④这一时期新设立的科研机构或新创办的学术期刊,无论是从其名称还是从其研究内容上,都能看出端倪。

二、二战后东西德区域研究和区域学的并行及统一

二战后,德国的域外研究曾陷入困顿和反思。在纳粹统治期间,不少知名学者被指政治不正确或血统不纯正,他们或被解职、被迫退休,或移民离开德国学术界。

① „Geschichte des IAI“.

②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6 – 147.

③ Rainer Nicolaysen, „Wandlungsprozesse d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im 20. Jahrhundert“.

④ 同注②, S. 145.

战后初期,许多曾支持纳粹政权的学者仍然留在各自的教席上。为了不引人怀疑,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话题,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各个国家的语言或文学研究上。因此,战后初期德国的域外研究基本聚焦于狭义的语文学领域,例如汉学的重点在于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章进行翻译、展示和评论,^①同样,非洲文学研究的兴起也是二战后德国非洲研究领域的新特点之一。^②

随着冷战序幕逐渐拉开,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前哨阵地,两个德国被迫分别倒向美国和苏联,这不仅左右着这两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也深深地影响着两国域外研究的重组和发展。

(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区域研究

联邦德国早期的外交重点在于与西方结盟和恢复国家主权,以及应对德国分裂和柏林危机,此时联邦德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还提不上重要议程。随着非殖民化浪潮的推进,第三世界新成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被卷入超级大国竞争的漩涡,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重新获得内政外交的部分主权后,也开始调整对亚非拉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美国要求联邦德国参与遏制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希望通过发展和经济援助,争取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支持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③在这一背景下,联邦德国开始讨论域外研究的重组和发展,并且受到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影响。美国的区域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出现。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现状,美国建立了各种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中心,汇聚了来自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提供政策咨询。这种有组织的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得到发展和推广。^④

效仿美国,联邦德国重建和新建了一批区域研究机构,如战后曾先后以拉丁美洲图书馆和伊比利亚-美洲图书馆名义存在的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于1962年得

^①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9.

^② 袁明清、刘中民:《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第12页。

^③ Vgl. Jürgen Rüländ/Nikolaus Werz, „Politikwissenschaft und Regionalstud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Politik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Band 27, 1. Auflage, 2010, S. 383–411, hier S. 384. 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是1955—196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针对民主德国及东方阵营推行的外交政策。它声称联邦德国单独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民主德国,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

^④ Vgl.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 11.

以恢复原名。随着1948年柏林自由大学的成立,三个大型区域研究中心也在此建立起来,分别为1951年成立的东欧研究所(Osteuropa-Institut)、1963年成立的肯尼迪北美研究所(John F. Kennedy-Institut für Nordamerika-Studien)和1970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所(Lateinamerika-Institut)。除了柏林,联邦德国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区域研究中心,如1950年赫尔德研究所(Herder-Institut)落户黑森州的马尔堡,成为联邦德国中东欧研究中心。1962年,海德堡大学设立南亚研究所(Südasieninstitut)。1965年,波鸿大学建立东亚研究学院(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1964年,德国海外研究所(Deutsches Überseeinstitut)在汉堡成立,下设四个研究部门,分别负责亚洲、中东及近东、拉美和非洲研究,后发展成为德国最知名的大学外区域研究机构之一。

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原来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主的院系调整了学科理念,社会科学取向和对现状的关注成为新的发展理念,这种调整在战后新成立的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1965年新成立的具有改革意识的波鸿大学,这一理念被从上而下地落实为一个独立的东亚研究学院,^①该学院也是德国国内迄今为止唯一具有学院地位的东亚研究机构。该学院的研究和教学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历史、文学、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开展研究。该学院设立的教授席位也不仅针对中、日、韩三国的语言和文学,还包括中国历史和哲学、日本历史、东亚政治、东亚经济。^②而新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学也将日本学和汉学整合进1968年成立的东亚研究所(Ostasiatisches Seminar),中文教学也转向以现代汉语为主。

随着1968年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新东方政策带动下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联邦德国对第三世界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明显增加,开展域外研究的大学机构不再局限于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主的院系,而是拓展到其他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院系。例如,科隆大学历史系设立了拉丁美洲历史教研室,由理查德·科内茨克(Richard Konetzke)担任主任,科内茨克后来参与创办了《拉丁美洲历史年鉴》,成为联邦德国拉丁美洲历史研究的开拓者,他撰写的《古代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著作。^③

^①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50.

^② 参见 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https://www.ruhr-uni-bochum.de/oaw/de/index.shtml>, 访问日期:2023-11-04。

^③ Vgl. Hermann Kellenben, „Richard Konetzke zum 70. Geburtstag“,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Band 4, 1967, S. XV - XXVI.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高校的政治学系也开始关注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外交政策，主要涉及拉丁美洲和亚洲。20世纪70年代，该主题被纳入许多大学政治系的教学内容。^①例如，美因茨大学政治系就设立了外国政治研究和发展援助教研室(Abteilung Politische Auslandsstudien und Entwicklungshilfe)，由曼弗雷德·莫尔斯(Manfred Mols)教授担任主任，他撰写的《20世纪的墨西哥》是德国多年来最全面的拉丁美洲国家专著。在莫尔斯教授的积极推动下，美因茨大学多次举办关于拉丁美洲研究的研讨会，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美因茨大学一度成为联邦德国拉丁美洲研究的重镇。1981年起，莫尔斯教授开始对亚洲感兴趣，在其著作《两个大陆的融合与合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对一体化的追求》中，他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出发，提出应从各个层面加强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可谓是联邦德国较早进行跨区域研究的学者。^②

(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区域学

二战后民主德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导致其域外研究的重点比联邦德国更早转向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域学(Regionalwissenschaften, 英译 regional sciences^③)。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重建以语言文学为主的传统域外国家研究的同时，民主德国的区域学出现了域外研究的新方向，历史学在这一时期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建国以来，民主德国一直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积极争取国家统一。但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并采取了包括外交封锁在内的种种措施压制民主德国。因此，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成为民主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初期，莱比锡大学历史系教授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提出进行全球比较殖民历史的研究计划。这一计划很快就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这正好契合了国家的外交需求，即通过支持亚洲、非洲和美洲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关系。这标志着民主德国开始开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1956年，位于波茨坦的德意志帝国殖民局向公众开放档案，恰

^① Vgl. Jürgen Rüländ/Nikolaus Werz, „Politikwissenschaft und Regionalstud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 384.

^② Vgl. Nikolaus Werz, „In memoriam: Manfred Mols (1935—2019)“,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Lateinamerikas*. Nr. 53, 2016, S. 11—13.

^③ Manuela Boatca, „Catching Up with the (New) West: The German ‘Excellence Initiative’, Area Stud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Huma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Self-Knowledge*, Vol. 10, Iss. 1, 2012, pp. 17—29. 该作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区域学是美国区域研究在德国的对应物(Counterpart)。

好为东德历史学家研究亚非拉国家的殖民制度和解放运动提供了史料。^① 马尔科夫认为：“从亚洲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地图进行了惊人的修改。在世界各地，‘非殖民化’的人民正在建立新的里程碑和标准……长达几个世纪的双重剥削的狂欢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结束；人民……将他们的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见证者、参与者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袖手旁观？”^②他认为应该用扎实的研究来帮助这些国家年轻的解放运动，并且应该在研究和教学中系统地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自1955年起，马尔科夫开始讲授非洲历史，并从1964年起担任莱比锡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莱比锡由此成为民主德国非洲研究的重要场地。在马尔科夫的影响下，其它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域外研究新动向，如柏林洪堡大学1960年也成立了由马尔科夫的学生、历史学家赫尔穆特·斯托克(Helmuth Stoecker)领导的德意志帝国主义殖民和海外扩张政策历史研究协会(Forschungsgemeinscha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Kolonial- und überseeischen Expansionspolitik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③

马尔科夫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域外研究人员^④，而且他推动的全球比较殖民历史研究有助于民主德国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帮助民主德国与众多国家建立外交承认之外的学术交流途径。例如，1959年，莱比锡大学在550周年校庆之际成立了莱比锡大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Asien, Afrika, Lateinamerika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并举行了关于非洲近代和当代历史的大型国际会议。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苏丹、法属西非、尼日利亚、南非、海地、法国和英国的200多名历史学家、非洲学家、东方学家、民族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共同讨论殖民时代的后果、新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国际影响。^⑤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民主德国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方案和科研、教学规划协调机制，在高校建立了跨学科的区域学。随着对外交往的深入开展，民主德国领导层意识到，只关注亚非拉国家殖民史的研究不能完全满足民主德国了解这些国家从语言到政治现状的外交实际需求。早在1963年2月，莱比锡的汉学家和文学家弗里茨·格鲁纳(Fritz Gruner)就向国务秘书处提交了一份

① Vgl. Matthias Middell, „Die Entwicklung der Area Studies in der DDR als Reaktion auf die Dekolonisierungsprozesse der 1950er-/60er-Jahre“, *Jahrbuch für Historische Kommunismusforschung*, 2019, S. 223 – 254, hier S. 229 – 230.

② 同上, S. 231.

③ Vgl. Max Zeuske, „Zur Geschichte der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der DDR“, *Quetzal*, Nr. 6/7, 1994, S. 8 – 11.

④ 同注①, S. 234.

⑤ 同上。

22 页的报告,建议按照区域(非洲、南亚、中亚和北非、东亚、东南亚)组建跨学科研究所,下设语言和文学部、历史部及经济部。^①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域外研究机构分散在不同地方,隶属于不同的中央国家机关,没有保证充分的协调和合作,并且出现了在职位、课题和年轻学者方面的竞争。于是,民主德国借第三次高等教育改革(Hochschulreform)之机,为域外研究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方案,并建立了三个中央协调机构,分别为:民主德国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Zentraler Rat für Asien-, Afrika- und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主要负责协调科研;亚非拉科学国家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ür Asien-, Afrika- und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主要负责寻求与国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和建立联系,如协调国际会议和国际访问的相关事宜;高等教育部的科学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beim Ministerium für Hoch- und Fachschulwesen),主要负责协调教学。这三个机构之间保持交流和沟通。^②其中 1966 年成立的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它是一个规划机构,接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科学部的指导,同时与外交部关系密切,负责规划和协调所有区域研究机构的科研内容、资金拨款和相关出版发行。^③自成立以来它的工作一直富有成效,如领导相关科研合作小组,尤其在发起大的理论项目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组织包括罗斯托克大学、莱比锡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的区域研究学者合作撰写《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的基本原则》。^④1973 年,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推出的学术期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Asien, Afrika, Lateinamerika)成为民主德国时期区域研究最具权威性的期刊,刊发论文的主题也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比较历史转变为以发展问题为主导。^⑤随着统一协调机制的出台,“区域学”(Regionalwissenschaften)这一概念也开始出

^① Vgl. Matthias Middell, „Die Entwicklung der Area Studies in der DDR als Reaktion auf die Dekolonisierungsprozesse der 1950er-/60er-Jahre“, S. 239.

^② Vgl.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Das Beispiel südliches Afrika“, *Wissenschaft und Wiedervereinigung: Asien-Afrikawissenschaften im Umbruch*, Berlin, 1998, S. 372 – 442, hier S. 386.

^③ Vgl. Max Zeusk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der DDR. Entwicklung und Ende“, *Quetzal*, Nr. 10, 1995, S. 26 – 30.

^④ Vgl. Kai Hafez/Gerhard Höpp, „Gegenwartsbezogene Orientwissenschaft in der DDR und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Kontinuität oder Neubeginn“, *Wissenschaft und Wiedervereinigung: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 im Umbruch*, Berlin, 1998, S. 96 – 151, hier S. 102; Dörte Ahrendt-Völschow, *Di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von 1958 bis 1995*, Universität Rostock, Institut für Politik- und Verwaltungswissenschaften, Rostock 2004, S. 24. 国内有一篇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东德非洲研究的翻译文章,其中也谈及该机构“给实际工作部门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详见(苏)文尼克等:《东德的非洲研究中心》,载《西亚非洲》,1980 年第 2 期,第 74 – 75 页。

^⑤ Vgl. Matthias Middell, „Die Entwicklung der Area Studies in der DDR als Reaktion auf die Dekolonisierungsprozesse der 1950er-/60er-Jahre“, S. 228.

现,取代了50年代末以来使用的“国家学”(Länderwissenschaften)。^①

这时期民主德国的区域学在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和教学安排上均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6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三次高等教育改革为了打破原有学科的利己主义,通过创建“院”(Sektionen)、引入“科学综合体”(Wissenschaftskomplexe)的方式来促进各学科之间的联系。^②根据这一原则并结合各大学的研究传统和特色,1968年,洪堡大学成立了亚洲科学院(Sektion Asienwissenschaften)。1969年,莱比锡大学成立了非洲和近东科学院(Sektion Afrika- und Nahostwissenschaften);1964年,罗斯托克大学成立了拉丁美洲科学院(Sektion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任职的教授涉及哲学和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法律、政治等学科。学生在为期五年的学制内,除了完成外语等基础课程,还可以进行历史、经济、文学、语言学方向的专业学习。^③

自跨学科的区域学在高校建立以来,民主德国与域外国家的交往得到进一步发展。民主德国科研机构与亚、非、拉美等国家的教育机构和大学保持密切交往,如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学者访问、学生交流等。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德国在域外研究中始终保持着与苏联的紧密合作,并接受苏联的指导,如民主德国常派年轻学者去莫斯科接受培训、与苏联定期举办工作座谈会,甚至连民主德国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也会在苏联科学院做出相关安排后再制定。^④

(三)两德统一后对东德区域学的政治清算

二战结束后,在冷战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倒向美苏阵营,这在其域外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联邦德国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影响下开展区域研究(Regionalstudien),兴建了一批区域研究所;而民主德国为争取外交承认,在殖民主义历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区域学(Regionalwissenschaften),并与苏联保持着密切合作。在两德统一前,两个德国各自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区域研究学者。联邦德国除了前文所提及的曼弗雷德·莫尔斯等拉丁美洲研究学者,还有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南亚历史学教授迪特玛·罗特穆特(Dietmar Rothermund),其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为德国和欧洲南亚研究奠定了基础。民主德国著名的区域研究学者如曾任罗斯托克大学拉丁美洲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的霍斯特·德

^① Vgl.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Das Beispiel südliches Afrika“, S. 374, Anm. 9.

^② Konrad Krause, *Alma mater Lipsiensis: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 von der Gründung 1409 bis zur Gegenwart*,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lag, 2003, S. 375–378.

^③ Dörte Ahrendt-Völschow, *Di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von 1958 bis 1995*, S. 18.

^④ Vgl. Max Zeusk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der DDR. Entwicklung und Ende“.

莱克斯勒(Horst Drechsler),其撰写的专著《赫雷罗族和纳马族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1884—1915)》获得国际认可,并于上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①可以说,两个德国这一时期的域外研究都出现了社会科学取向,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场域下平行发展、并驾齐驱^②,但这种状态随着两德统一的到来很快被打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主德国的域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的区域学无论在科研机构设立、科研人员配备还是学科人才培养方面都形成了较完整的跨学科体系,成立了如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科学院、莱比锡大学非洲和近东科学院、罗斯托克大学拉丁美洲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其中罗斯托克大学拉丁美洲科学院的教授席位从建院之初的3个增加至1990年的10个,分别为历史学4个,经济学3个,社会学、语言学和哲学各1个教席。^③民主德国区域学专业教学大纲规定学生53%的学习时间用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多学科的区域研究方法,其余约47%的时间用于语言学习。^④譬如,莱比锡大学的非洲和近东科学院为非洲学(Afrikanistik)设立的主修科目和辅修科目包括非洲文学和文化、非洲历史、非洲生态学、非洲哲学、非洲语言学以及社会学和国际法,两至三门非洲语言以及至少一门现代外语,另外还需要在大学的其他院系进行跨学科的学习。^⑤学生毕业论文的主题也能反映出这种跨学科育人的理念,如罗斯托克大学拉丁美洲科学院144篇硕士毕业论文(Diplomarbeiten)^⑥的研究重点除了政治和经济主题,还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截至1974年,该学院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中有4篇经济学论文、4篇历史学论文、5篇文学论文和1篇语言学论文。^⑦同样,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80%以上的东亚研究博士论文关注20世纪的东亚,尤其集中于政治、现代史和

^① Vgl.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Das Beispiel südliches Afrika“, S. 392, Anm. 75.

^② 多位德国学者使用“parallel”(平行的)一词来描述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区域研究并行发展的状况,具有代表性的有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41 - 155; Waltraud Schelkle, „Die Regional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als Modell einer Entwicklungs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 und Wiedervereinigung: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 im Umbruch*, Berlin, 1998, S. 21 - 94.

^③ Vgl. Max Zeusk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der DDR. Entwicklung und Ende“.

^④ Vgl. Waltraud Schelkle, „Die Regional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als Modell einer Entwicklungswissenschaft“, S. 74.

^⑤ 同注^①, S. 415 - 416.

^⑥ 民主德国大学毕业论文分为硕士(Diplom)和博士(Doktor)两个级别,没有设置现在的学士(Bachelor)这一级别。

^⑦ Dörte Ahrendt-Völschow, *Di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von 1958 bis 1995*, S. 26 - 27.

经济领域。^①

有鉴于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区域学与联邦德国的区域研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更具优势。例如,在人才培养方面,民主德国的区域学专业课程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广,而联邦德国的区域研究课程目录则相对较窄;前者更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后者更强调研究对象的主体特点。^② 在组织架构方面,联邦德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无政府”的,每个研究对象范畴内存在许多研究所和部门,其中大多数研究机构之间缺乏规范的交流,更不用说在研究内容上进行协调。而民主德国区域研究在国家层面设立了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等顶层机制,发挥着党、国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纵向沟通以及在科学共同体内横向沟通和协调的功能,通过下设大型研究项目或全国性的工作组,将区域学研究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进行理论创造。^③

然而,无论民主德国区域学在人才培养或机构建设方面存在多少可取之处,也不论其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是否已经获得国际认可,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有多不同,1990年两德统一后,前东德的区域研究人员与学术机构都遭受了政治清算。罗斯托克大学的拉丁美洲科学院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罗曼语研究院(Institut für Romanistik)。罗曼语研究院仅设立了伊比利亚美洲语言学、法语和意大利语语言学、伊比利亚美洲和法语文学以及教学法教授席位。^④ 而柏林洪堡大学的亚洲科学院在重组过程中,不得不去除一些科目如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从而放弃了以前存在的“处理整个亚非世界的多学科科目组”。^⑤ 其中,汉学研究所1990年拥有21名教职工,是德国所有大学中规模最大的汉学系,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现代和古代汉语、笔译和口译、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然而到了1993—1994年,由于政治压力造成的解雇和离职潮,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只剩下几个人,而且重组后的汉学只能是语言学和文

① Thomas Kampen, „Ostasien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und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Wissenschaft und Wiedervereinigung: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 im Umbruch*, Berlin, 1998, S. 269 – 306, hier S. 295.

② Waltraud Schelkle, „Die Regional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als Modell einer Entwicklungswissenschaft“, S. 76.

③ Kai Hafez/Gerhard Höpp, „Gegenwartsbezogene Orientwissenschaft in der DDR und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Kontinuität oder Neubeginn“, S. 150.

④ Dörte Ahrendt-Völschow, *Die Lateinamerika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von 1958 bis 1995*, S. 34.

⑤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Das Beispiel südliches Afrika“, S. 422.

化研究方向。^①

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德统一给东德的区域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政治清算,原来民主德国区域学科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其建立起来的跨学科的区域学又回到以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全盘否定,而在一些德国学者看来,原本这种理论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对于分析和理解如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用的。^②

三、21世纪获得新发展动力的德国区域研究

德国统一后,其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5年3月,时任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格(Roman Herzog)提出了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问题,他说:“在一个日益变小的、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③这一时期,德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力求成为全球化和多极化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大国。

(一)面临发展新机遇与挑战

随着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德国对域外知识的需求也相应增大,因为“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和提高竞争力,必须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发展德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远程能力(Fernkompetenz)。只有具备了广泛的专业知识,才有可能成功地与世界不同地区开展交流”。^④这种需求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议会、政府、媒体、企业、协会和发展政策组织在其行动领域需要特定的区域知识,需要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和建议,以跟上当地的变化”。^⑤尤其是在2001年“9·11”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德国朝野真切意识到特定区域知识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而且有助于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和冲突。然而,与对域外知识迅速扩大的需求不相符的是德国区域研究的发展状况。“在德国,区域研究既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得到大量的资助,也没有像在美国那

^① Mechthild Leutner, „Zehn Thesen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China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151 – 152.

^② 同上, S. 153。

^③ 转引自顾俊礼:《德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④ „Bekanntmachung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von Förderrichtlinien zur Stärkung und Weiterentwicklung der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https://www.bmbf.de/foerderungen/bekanntmachung-383.html>, 访问日期:2023-11-04。

^⑤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 12.

样得到连贯的实施”^①，“对近东和中东以及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德国还没有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那样具有深厚传统”，“区域性的专业知识往往更多地与行业的主流分离……区域研究人员传统上较少融入(主流)，也较少得到认可”。^②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德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外交需求，并响应欧盟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zess)^③，在世纪之交执掌德国政坛的施罗德政府积极推动德国学术界进行重组，于2005年正式推出“联邦和各州促进德国高校科学研究的精英倡议计划”，简称为“精英倡议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通过严格的评审程序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少数优秀的“研究生院”“精英集群”和“未来构想”资助项目，以提高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④

面对机遇和挑战，德国学术界积极响应，与科学决策机构的代表一起启动了一场关于重组区域研究的讨论。2005年7月，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与德国科学基金资助者协会(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共同举办了“德国区域研究的未来”国际会议，邀请了许多德国、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⑤2005年12月，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弗莱堡大学联合举办了“德国的区域和文化研究以及新的学制”会议，邀请了120名来自亚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的社会、文化和语言学科的代表齐聚弗莱堡大学，研讨参与区域研究的学科该如何应对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变化，并发表了《关于德国区域研究未来的弗莱堡备忘录》。^⑥

在上述会议讨论的基础上，2006年7月，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⑦发表了一份长达92页的《关于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区域研究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文件，对区域研究的概念及其内涵、方法论等进行了定义，指出区域研究的核心仍然主要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区域，但研究机构各自的区域概念必须

① Manuela Boatca, “Catching Up with the (New) West: The German ‘Excellence Initiative’, Area Stud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p. 24.

②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 12.

③ 博洛尼亚进程是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目标是实现欧洲范围内课程和学位标准化，并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由于传统的德国大学采用的是Magister和Diplom学位，相当于硕士文凭，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引入本科(Bachelor)和硕士(Master)学位对德国高校意味着一场彻底的转变。

④ 郭婧：《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德国精英倡议计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⑤ 同注②，S. 13。

⑥ „Regional-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und die neuen Studiengänge“,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Vol. 37, No. 1-2, 2006, S. 192-198.

⑦ 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是欧洲成立最早的科学政策咨询机构，也是德国最重要的科学政策咨询机构。1957年9月5日，该机构成立，并就有关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内容和结构发展的所有问题向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建议。

对变化保持开放,区域不能以静态的方式定义,必须从各自研究问题的角度重新确立。该文件着重指出应使用“区域研究”(Regionalstudien)、避免使用“区域学”〔Regionalwissenschaft(en)〕这一术语,因为后者让人以为是“具有自己的方法和原则的独立科学(eigenständige Wissenschaften),与之相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Regionalstudien)的科学就是各专业学科(Fachdisziplinen)”。^①《建议》还对德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定位和组织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出建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机构建设方面,德国必须保持并在结构上加强现有的区域相关专业,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组建更大的跨学科研究联盟(Forschungsverbund)。这一建议主要是针对德国开展区域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存在异质性和数量广泛的特点,应让牵头大学和学科本身在跨学科研究联盟中受益,使其形象更鲜明,从而创造协同效应。对于那些涉及整个国家利益的区域,可以考虑建立国家中心(nationale Zentren),具体地点可以通过竞争来选拔,联邦政府应该为此提供相应的资助方案。^②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教育与区域研究能力的培养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但必须确保学生至少在一门学科内进行方法论和理论培训,并且获得足够的语言和跨文化能力。“一方面,这提供了科研的基础,可以让学生进行更高级别的学习或研究。另一方面,区域研究理所应当开展跨学科合作,要求所有参与者在方法上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并能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分析区域的具体对象。”^③另外,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学生应该获得语言学习和海外交流的机会。科学委员会强调,博士生和博士后的资格认证必须始终在学科中进行,方法和理论上立足于某个学科是区域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在国际化方面,德国区域研究机构应该与所研究区域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和定期联系,例如,开展学生交流、聘请客座教授、德国研究人员在国外开展研究或讲座访问、外国学者在德国机构访问,以及开展联合科研项目等,并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洪堡基金会等机构继续提供资助。德国大学招收和选拔外国学生的程序应该加快,并且更加灵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在伙伴大学联合设立海外办事处来实现特殊的协同效应,以促进学生的流动。^④

德国科学委员会发表的这份《建议》给德国区域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影响深

①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 7.

② 同上, S. 29。

③ 同上, S. 37。

④ 同上, S. 40。

远。德国从联邦到各联邦州均以此为参照,大力推进各地区域研究机构的发展,并推出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措施。

(二) 当今德国区域研究的主要机构类型及其特色

由于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文化教育属于各联邦州的管辖范围,因此德国区域研究的组织机构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总的来说,德国从事区域研究的机构从组织属性上可以分为大学内和大学外两种类型。

1. 大学内区域研究机构

大学内区域研究机构是指隶属于大学的区域研究机构。德国的许多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都拥有区域研究机构,其中大部分隶属于大学的某个院系,如人文学院、哲学系或社会科学学院。这类从事区域研究的机构不少是在2005年后从各综合性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或东方学等专业发展而来,而且通常聚焦于该专业对应的某个特定区域。例如,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将日本学研究所、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合并成东亚学中心(Zentrum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与此类似,慕尼黑大学在文化研究学院开设了亚洲研究系(Department für Asienstudien),也将汉学研究所、日本中心以及印度学和伊朗研究所囊括其中。而莱比锡大学则是在2020年直接将历史、艺术和东方学学院更名为历史、艺术和区域研究学院(Fakultät für Geschichte, Kunst und Regionalwissenschaften)。这种由原来外国语言文学或东方学发展而来的区域研究机构承担着专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任务,大部分开设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但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较偏重于传统的语言学、文学、宗教、历史和文化方向,尤其是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

在建校历史较短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二战后成立的德国大学中,区域研究则更多地彰显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尤其更加注重社会科学取向和对研究区域现状。北威州鲁尔地区两所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波鸿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颇具代表性。波鸿大学的东亚研究学院不但拥有语言、历史、文化等各教研室,而且还设立了东亚政治、东亚经济、东亚跨国政治经济三个教研室。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东亚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隶属于该校社会科学学院,汇聚了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从事有关当代东亚的研究和教学,重点关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为响应德国科学委员会的《建议》,这两所大学还联合成立了鲁尔东亚研究联盟(Alliance for Research on East Asia Ruhr,简称Area Ruhr),该研究联盟拥有20多名教授、约100名研究人员和1600多名学生,已经成为欧洲东亚研究领域最大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之一。它涵盖了从历史到当代研究、从语言学到经济学、从宗教研究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

广泛学术领域和学科。^①

除了隶属于院系的区域研究机构,德国一部分综合性大学为加强本校的区域研究,还另外在校级层面设立区域研究中心。这种校级层面的区域研究中心在人员、物资等方面均能够获得学校的鼎力支持。如海德堡大学 2003 年成立的海德堡美国科学中心(Heidelberg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将整个学校与美国相关的 6 个学院和 10 个学科捆绑在一起,极大地提升并丰富了美国研究专业知识的多样性。^②

2. 大学外区域研究机构

大学外区域研究机构是指不隶属于大学,而是独立于大学之外、从事区域研究的科研机构。德国这类区域研究机构与大学内区域研究机构相比数量少得多,但研究范围往往覆盖多个区域,并且关注研究区域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动态,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为德国政界和商界提供政策咨询,在人才培养方面通常只开设博士生培养项目。

德国大学外区域研究机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汉堡的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简称 GIGA)。GIGA 从属于莱布尼茨学会,由联邦外交部和汉堡州经济和劳动部在联邦—州政府资助框架内提供资金,并接受第三方资助。该研究所的前身为 1964 年成立的德国海外研究所(Deutsches Überseeinstitut),2006 年更改名称并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GIGA 拥有 4 个研究所,分别对应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 4 个区域。GIGA 强调其“在工作上、范围上、结构上”面向全球的特点,目前有 90 多名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学者在 GIGA 从事区域研究,其中包括几十名博士研究生和初级研究员。^③ GIGA 与全球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专业协会开展合作,并且十分重视将其科研成果进行知识转移,每年都会通过科学出版物、会议、讲座、新闻媒体等形式向公众开放其研究成果,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德国区域研究机构。在政策咨询方面,GIGA 与德国联邦外交部和联邦议院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相关区域的专业知识和评估报告,为此 GIGA 还专门在柏林市中心增设了办公室。

类似的大学外区域研究机构还有位于波恩的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和位于柏林的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前者关注非洲、中东和北非、拉丁美洲、东亚、南亚、中亚及东欧这 6 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

^① “Alliance for Research on East Asia (AREA) Ruhr”, <https://www.area-ruhr.de/>, 访问日期:2023-11-03。

^② „Über uns“, <https://www.hca.uni-heidelberg.de/ueberuns/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3-11-03。

^③ “Team GIGA”, <https://www.giga-hamburg.de/de/das-giga/team>, 访问日期:2023-11-05。

展,并就相关课题进行研究,主要向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联邦议院以及其他决策机构提供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合作方面的建议。^①后者关注全球外交和安全政策,根据不同研究领域设立了7个研究部和1个研究中心,分别为非洲和中东、美洲、亚洲、欧盟/欧洲、东欧和欧亚、全球问题、安全政策研究部,以及土耳其研究应用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就国际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为德国联邦议院、联邦政府提供政策咨询。^②

统一后的德国努力成为全球化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大国,加大了对区域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德国的区域研究因此在21世纪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无论是大学内还是大学外的区域研究机构,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多个大型研究中心和跨区域研究联盟得以建立,并吸引了一大批区域研究人员。为推动德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德国从官方到企业以及基金会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例如,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从2009年开始专门对区域研究项目进行大规模资助,以2021年为例,8个合作项目和4个独立项目将在3年内获得共计约2000万欧元的资助金额。^③大众汽车基金会和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也是区域研究的积极资助者。在德国精英倡议计划的名单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从事区域研究的研究生院和精英集群,其中从事区域研究的研究生院从第一轮1所增加到第三轮的5所,分别为柏林自由大学的北美研究所、穆斯林文化与社会研究生院、东亚研究生院,拜罗伊特国际非洲研究生院,以及慕尼黑大学东欧和东南欧研究生院。^④

四、结 语

德国的区域研究发轫于东方学,最初目的是为辅助解读《圣经》并隶属于神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后期,受英国和法国东方学转型的影响,德意志东方学逐渐摆脱神学桎梏,东方学教席从神学系移至哲学系,并逐渐获得学科认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德国开始进行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建设,主要是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服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区域研究先后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兴盛和纳粹时期的至暗时刻,并从帝国时期殖民学背景下专注于语言及专门知识的东方学转向内涵更丰富、更系统化的外国研究。二战后,德国域外研究经历了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的区域研究和民主德国的区域学并行发展的阶段。两德统一

① “Regional Expertise”, <https://www.idos-research.de/en/research/regional-expertise/>, 访问日期:2023-11-05。

② „Forschungsgruppen“, <https://www.swp-berlin.org/en/>, 访问日期:2023-11-05。

③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https://www.geistes-und-sozialwissenschaften-bmbf.de/de/Regionalstudien-Area-Studies-1715.html>, 访问日期:2023-11-04。

④ „Exzellenzinitiative“,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xzellenzinitiative>, 访问日期:2023-11-04。

初期,民主德国区域学遭到政治清洗,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德国国际地位提高再度获得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

通过梳理德国区域研究自东方学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区域研究的建构与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需要息息相关。当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恰逢其时。但应该如何建设这一新学科众说纷纭,借鉴德国区域研究发展的经验,或可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一些启发。

在组织架构方面,我国可在国家层面设立如区域国别学科指导委员会等顶层统筹机构,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制定政策并指明方向。随着我国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相应的学科评议组也将成立。^① 民主德国的亚非拉科学中央委员会等几个国家级机构在其区域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统筹规划的作用,但其作用与学科评议组有所不同,它受党和国家的委托,负责规划和协调所有区域研究机构的科研内容,尤其在发起大理论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建立类似顶层设计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纵向沟通以及在各科研机构之间横向协调的功能,既能将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与科研机构的学科发展进行对接,又能组织科研机构开展宏观的跨区域研究,将优秀的区域国别学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就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进行研究和理论创造,努力构建具有自主性和引领性的中国理论。

在机构设置方面,我国可根据各高校的办学特点,以特定区域为单位建立研究中心,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跨区域研究联盟。最近十几年,德国的区域研究尽管出现了跨区域趋势,并建立了一些跨区域研究联盟,但从事区域研究的机构,尤其是承担本硕博人才培养任务的高校,大多数还是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划分,如拉美、非洲、中东、东亚、东南亚等,再在这些区域下面细分出若干个从属部门,针对该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专门研究。跨区域的研究联盟大多是区域性科研机构之间开展合作的一种方式。我国很多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特色,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并与其他院校加强交流合作,组成跨区域的研究联盟,从比较视野来考察跨区域的问题。教育部正在推进建设中的国别区域联合研究院也将进一步促进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优势互补和深度融合。^②

^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21-12-06,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06/content_5656041.htm, 访问日期:2023-11-04。

^② 《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教育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会》,2022-09-2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9/t20220929_666016.html, 访问日期:2023-11-04。

在学科队伍方面,各高校可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建立多学科、跨学科的人才队伍。无论是民主德国的各区域科学院,还是联邦德国的各区域研究中心,区域研究从业人员均来自不同学科,尤其以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法律等学科为主。作为一级交叉学科,我国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虽然教育部尚未出台关于具体落实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政策条文,但可以预见的是,开设区域国别学的机构应该至少包括上述4个门类的专业学者。而这4个门类包含16个一级学科和几十个二级学科方向,内涵容量如此之大,充分体现了这一交叉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各高校在组建区域国别学人才队伍时,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妨先立足本校的优势学科,结合本校的区域研究特色,打破学科界限和学术藩篱,组建一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人才队伍。唯有先组建一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交叉复合型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应摒弃单一学科的培养理念,以外语知识和技能学习为基础,以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和理论方法学习为主导,为本硕博各阶段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规划性和连贯性。联邦德国科学委员会认为区域研究的任务是科学地研究其他社会(尤其是当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动态^①,因此把掌握对象国语言作为开展区域研究的必备条件,重视外语在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鼓励学生前往对象国交流和学习。同时,它还强调必须立足现有学科,在现有学科内对学生进行方法论和理论培训。或许是出于对民主德国区域学的否定和对美国区域研究的效仿,联邦德国科学委员会不认可区域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因此在承认区域研究跨学科属性的同时,强调人才培养的学科定位,即立足于某一学科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方法培养。我国将区域国别学纳入学科目录,在学科创建上可谓是一大突破,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应当摒弃单一学科的培养理念,努力搭建多学科、跨学科的课程体系,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知识培养体系。

在学位设置方面,民主德国的区域学和联邦德国的区域研究均覆盖本硕博三个阶段,以确保人才培养的连贯性。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目前只被列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意味着只涉及硕士和博士两个级别的人才培养,尽管作为一个正在探索过程中的新兴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贯通,应该把本科阶段一并纳入、统筹规划。

在学科共建方面,高校可以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提供项目资助。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可以为国家外

^①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 7.

交战略提供政策咨询,而且也能够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贡献专业知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一些跨国企业如大众、博世等都是德国区域研究机构的积极资助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海外目标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市场规模、竞争状况、消费偏好、文化传统等,而区域国别研究恰好能为这些企业提供相关咨询,因此可以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促成高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良性循环,为区域国别学的后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出现正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战略需要。在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和建设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赋予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责任编辑:郑春荣